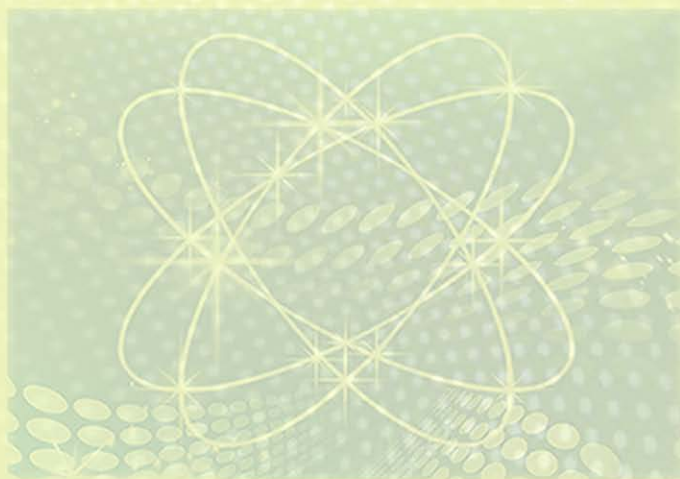


改革开放 30 年 成都经济发展道路

阎星 等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革开放 30 年·成都经济发展道路/阎星等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11
ISBN 978-7-220-07995-5

I. 改… II. 阎… III. 地区经济-经济发展-概况-成都市 IV. F127. 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9077 号

GAIGE KAIFANG 30NIAN · CHENGDU JINGJI FAZHAN DAOLU

改革开放 30 年·成都经济发展道路

阎 星 等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江 风
程世兴
杨 潮
徐 英
丁 青 李 进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s.com.cn>
E-mail: scrmcbf @ mail. sc. cninfo. 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259459 86259455
(028)86259524

照 排
印 刷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省印刷制版中心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9. 25

字 数

300 千

插 页

2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220-07995-5

定 价

58. 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86259624

序 言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年均近 10% 的高速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七大报告用这样的语言高度概括了中国 30 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

要理解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的巨大成就，离不开“体制转轨”这一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着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路径，基本实现了资源配置由计划逐步转向市场配置、经济主体逐步由政府官员转向农民和企业、经济运行逐步由封闭转向开放。在这一过程中，每一次制度上的变革都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和经济效率的显著提升。

在“体制转轨”的同时，改革中央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通过“地方分权化改革”引入地区间的竞争以此推动整体经济发展，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环节。通过 20 世纪 80 年代财政大包干（“分灶吃饭”）制度以及随后一系列分权化变革，中国的地方政府主要是省市州政府获得了发展地方经济的权

力，形成了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在“体制转轨”、“地方分权化改革”共同作用下，各具特色的充满活力的区域经济蓬勃发展起来。

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发展极不平衡，改革开放初期就实行了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和让一部分地区、一部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东南沿海地区在接受国际市场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移和走向国际市场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成为了对外开放的发轫区域。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率先推进市场化改革，汇聚国内外资源和生产要素，发展了大进大出的高度的外向型经济，逐步成为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率先起飞的经济“增长极”。

沿海率先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内创造了占全国近 2/3 的 GDP，大大提升了我国的国力，同时东西部差距随之拉大，到上世纪末，中国已出现了调整发展战略的需要和可能，随之实行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向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一些原来仅适用于经济特区的特殊性政策也成为了普惠性政策，中国总体区域发展战略开始形成，区域发展进入了一个各施所长、异彩纷呈的阶段。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对我国中西部区域性中心城市——成都 30 年的经济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入研究，探寻其在 30 年中走出了怎样一条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意义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既是对成都经济发展 30 年经验的总结，也是从区域发展这一解读中国改革开放不可或缺的视角，对中国 30 年发展历程的回顾和展示。

二

成都是四川省省会，中西部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之一。早在文明启蒙时代，成都就已经是长江上游文明的中心；在古代，成都把天府农业文明的优势和辉煌发挥到了极致，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主的古典城市经济高度发展；到了近代，由于地处西部内陆，成都继续迟滞于农业文明阶段，工业化进程明显落后于重庆等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城市 and 新兴工商业城市。进入 20 世纪中叶以后，工

业文明开始大规模进入成都，现在成都已是一个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现代化城市，但发展仍然落后于沿海。纵观成都发展历史，“内陆区域性中心城市”这一特点是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

要理解成都改革开放 30 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也不能脱离“内陆区域性中心城市”这一特点。由于地处西部内陆，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成都对外开放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条件，远不能与沿海城市相比；但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成都也在内陆地区具有无可比拟的市场辐射能力以及历史积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魅力，这使得成都具有成为与沿海多个经济增长中心相辅相成的内陆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条件和要求。“根植于区域经济”是决定其经济发展道路的关键因素。

基于上述认识，本书试图从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出发，对成都改革开放 30 年历程进行梳理和分析。从发展经济学理论看，发展指的是落后者的增长，发展经济学旨在解决的特殊问题是，落后的经济如何增长得更快从而追赶上发达经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描述其增长状况仍是描述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核心。在第一章中，本书从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波动周期、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对成都市经济增长的历程进行了描述，从中看出改革开放 30 年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变动对成都经济发展的影响。在第二章、第三章中分别以工业化、城市化的一般规律为依据，对成都市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分析，探索了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和近年来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新的举措。在第四章中，分别从改革进程、阶段划分以及具体改革措施等方面的分析来回顾成都经济转轨历程，力图寻找出在成都经济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制度变革因素。在第五章中，着重从开放区域中的经济增长极这一特征出发，从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合作等方面实践与特点的分析来阐释成都对外开放历程。当技术和制度因素被看做内生变量之后，对外开放就不再仅仅是要素、资源的跨区域流动，更多地，被认为是以深化分工促进经济效率提升的途径，本书对这一点也作了探索。

通过本书分析，我们看到成都改革开放 30 年的经济发展充分展示的是一个内陆区域性中心城市立足发展基点较低的现实，充分发挥转轨中的政府作用，

逐步探索出差异化发展道路的历程。从经济转轨和对外开放的历程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成都曾一度领先，但总体上滞后于沿海；进入 21 世纪后，成都日益重视地方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作用，特别是 2003 年后，针对在全国特别是内陆地区发展中形成重大制约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以统筹城乡、“四位一体”科学发展战略为总领，实施了包括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市场化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创新，逐步走在了全国改革开放的前列。与此相对应，成都经济增长、工业化、城市化在进入 21 世纪后展现出了新的特征，经济增长与全国差异的特征不再明显，进入持续快速增长的轨道；工业化发展提速，工业化综合指数由 2001 年的 35.4 上升到 2007 年的 61.7，年均上涨了 3.7，上涨速度要远快于 1978 年至 2000 年 0.6 的平均上涨速度；城市化逐步由以城带乡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向城乡统筹的相对均衡的发展模式转变，城市化水平和质量显著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

按照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定义，人均 GDP 在 900 美元以下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从 900 美元到 11000 美元左右为中等收入国家。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国家范围内徘徊，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对于产生“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普遍归结为“各国赖以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战略，对于他们向高收入攀升是不够的”。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发展中城市，成都人均 GDP 于 1996 年为 953 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进入 21 世纪后，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2007 年人均 GDP 达到了 4108 美元，短短不到 10 年的时间内，成都人均 GDP 增长了近 2 倍。但同时，成都也出现发展中的失衡：一是投资和消费结构的失衡，从国际经验看，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大致为 25 : 75，2007 年，成都资本形成率与最终消费率之比为 59.3 : 42.8，投资和消费比例偏离正常水平，行政力量主导的投资过快增长是造成这一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1998—2007 年 10 年间，成都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了 10.1 倍，而城镇居民可支

配收入仅增长了 1.3 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了 1.1 倍，收入分配中的财政倾向明显；三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失衡，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发展的速度却有所滞后，表现在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不大，居民经济收入提升的同时公共权利变化不大，等等。

未来，成都是否能有效克服发展中的失衡，顺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以历史昭示未来。本书最后的部分，在对成都改革开放 30 年历程进行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探寻出一条经济增长、工业化、城市化、经济转轨与对外开放协调互动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探寻是有意义的，可供成都未来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林凌

2009 年 9 月 2 日

目 录



第一章 经济增长

第一节 经济增长的基础与条件	(2)
一、经济基础	(2)
二、资源要素	(4)
第二节 经济增长与周期性波动	(6)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性波动	(6)
二、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特征	(8)
三、成都与全国的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关系	(11)
第三节 经济增长的阶段特征及评价	(12)
一、阶段的划分	(12)
二、频繁剧烈波动阶段的特征及评价 (1978~1992 年)	(12)
三、波动趋于平缓的阶段特征及评价 (1993 年至今)	(17)
第四节 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	(22)
一、关于全要素贡献率	(22)
二、成都市经济的 C—D 函数	(23)
三、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及特点	(25)
第五节 经济增长的动力	(34)

一、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变化	(34)
二、对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评价	(37)
三、对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评价	(40)

第二章 工业化

第一节 工业化的条件与基础	(45)
一、工业化条件	(46)
二、工业化基础	(47)
第二节 工业化进程阶段划分	(48)
一、工业化进程划分指标与研究路径	(48)
二、阶段性阈值及权重确定	(50)
三、数据处理及划分结果	(51)
第三节 工业化各阶段特征	(56)
一、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初期阶段 (1978~2000 年)	(56)
二、工业化中期阶段 (2001 年至今)	(62)
第四节 工业空间布局的演变和发展	(67)
一、工业空间布局的演变历程	(67)
二、东郊老工业区的调整改造	(71)
第五节 工业化评价	(72)
一、总体评价	(72)
二、工业经济发展比较优势评价	(75)
三、服务业发展比较优势评价	(82)

第三章 城市化

第一节 城市化的基础	(85)
一、自然条件	(85)
二、城市发展	(86)
三、城市化基础	(87)
第二节 城市化进程	(88)
一、城市化初期 (1978~1993 年)	(89)

二、城市化中前期（1994～2004 年）	（ 94 ）
三、城市化中后期（2005 年以后）	（ 98 ）
第三节 城市人口演变特征	（102）
一、城市人口演变总体特征	（102）
二、城市人口空间演变特征	（105）
第四节 城市空间演变特征	（107）
一、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	（107）
二、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特征	（112）
第五节 城市化的城乡关系特征	（115）
一、城乡分割时期农村发展滞后	（115）
二、城乡统筹时期城市反哺农村	（118）
第六节 城市化影响因素分析	（120）
一、工业化	（120）
二、城市化战略	（124）
三、市场化改革	（126）
四、户籍制度	（127）
五、土地制度	（129）
六、行政区划调整	（131）
第四章 经济转轨	
第一节 经济转轨的起点	（137）
一、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137）
二、经济转轨的提出	（139）
第二节 经济转轨的总体特征和阶段划分	（141）
一、成都市经济转轨的总体特征	（141）
二、成都市经济转轨的阶段划分	（144）
第三节 经济转轨的目标摸索阶段	（146）
一、改革的主要内容	（146）
二、对本阶段改革的评价	（151）

第四节 经济转轨的全面展开阶段	(155)
一、改革的主要内容	(155)
二、对本阶段改革的评价	(160)
第五节 经济转轨的深化创新阶段	(163)
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化经济转轨	(163)
二、改革的主要内容	(165)
三、对本阶段改革的评价	(170)
第五章 对外开放	
第一节 对外开放的起点	(174)
一、封闭型经济的形成	(174)
二、成都封闭型经济的基本特征	(175)
第二节 外商直接投资	(176)
一、发展历程	(176)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	(178)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181)
第三节 对外贸易	(182)
一、发展历程	(183)
二、对外贸易格局的变化	(184)
三、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评价	(189)
第四节 国内经贸合作	(191)
一、发展历程	(191)
二、国内经贸合作的举措	(192)
三、国内经贸合作的成效	(194)
第五节 “走出去”	(197)
一、“走出去”的基本特征	(197)
二、对成都“走出去”的评价	(198)
第六节 对外开放的基本评价	(200)
一、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200)

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201)
三、加速工业化进程	(201)
四、加快现代化进程	(202)
五、为体制改革注入动力	(202)
六、提升城市地位和影响力	(202)
第六章 可持续发展	
第一节 三十年道路评述	(204)
一、从起飞到跨越	(205)
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206)
三、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跨越	(208)
四、具有特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	(209)
五、“要素集聚、政府推动、投资拉动”的内陆区域性中心城市 经济发展模式	(212)
第二节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选择	(215)
一、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215)
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216)
三、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28)
第三节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230)
一、消费与投资并重的增长方式	(230)
二、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235)
第四节 新型工业化道路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237)
一、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体系	(238)
二、服务经济为导向的产业发展	(240)
三、适宜成都的工业经济	(243)
四、成都特色的现代农业	(248)
五、以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251)
第五节 新型城市化道路与新的空间形态	(255)
一、城乡一体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256)

二、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城乡空间形态	(261)
第六节 统筹城乡发展的改革创新	(268)
一、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体制与统筹城乡发展	(268)
二、深入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改革方向和重点	(270)
第七节 全球化进程中的内陆城市与扩大开放	(273)
一、成都：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国际枢纽城市	(274)
二、成都与成都经济区、成渝经济区	(278)
参考文献	(288)
后 记	(292)

第一章

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的增加，以及决定生产能力的诸因素的扩大和改进。即经济增长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一个国家、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的实际增加量或它们的实际增长率；另一方面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地区潜在的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增长受动力结构、体制、政策、要素（资源）投入等因素变动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特征。本章以经济周期性波动阶段及其特征为切入点，首先将成都市经济增长阶段划分为经济增长频繁出现明显起伏和经济增长波动趋于平缓两个阶段，并以投资、消费等内在动力为主线对经济增长各阶段的特征进行分析和评价；然后就资本、劳动力、科技等生产要素对成都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进行测评分析；最后从投资、消费角度对成都市经济增长动力进行了研究。

第一节 经济增长的基础与条件^①

一、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经济建设在十年动乱中遭受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与全国其他城市一样，成都的国民经济在调整中逐步走向正轨，各项经济指标开始恢复增长并有多项指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经济增长的基础仍然比较薄弱。

（一）经济总量

从新中国成立到 1978 年，成都的经济总量增长缓慢，而且由于“大跃进”和十年动乱的影响，这一阶段国民经济增长呈现出了明显的波动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都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后，成都地区生产总值^②达到 10.4 亿元，但 1958 年的“大跃进”却将成都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1961 年国家经济调整有效调动了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使成都各项经济指标有了明显的改善，到 1964 年，恢复到“大跃进”之前的水平。但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却又使成都经济建设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损失和挫折，工农业生产萎缩，商品供给极度紧缺。在这期间，尽管成都市是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新建了一批航空航天、兵器、通讯、机械等生产、科研企事业单位，但这一特殊的有利条件也因“文化大革命”而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1966 年至 1976 年间，成都工农业生产仅增长了 42.3%，年均仅递增 3.6%，其中工业年均递增 4.4%，农业年均递增 2.2%；十年间粮食总产量增长 18.7%，而同期人口增长率却达到了 26.1%。这一时期，国民经济陷入停滞，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极其低下。拨乱反正后，成都经济逐渐走上正轨，到 1978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35.9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是 1949 年的 5.4 倍，人均地

① 本书所用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成都统计年鉴》和《成都五十年》或根据其数据计算得出。

② 后文中涉及到国民生产总值和地区生产总值均缩写为 GDP。

区生产总值为 448 元，是 1949 年的 5.6 倍。

（二）产业发展

新中国成立时，成都的三次产业产值比例为 73.4 : 9.7 : 16.9，农业占绝对主导地位，工业基础薄弱，服务业严重不足。到 1978 年，产业结构有了明显的改善，三次产业比例为 31.8 : 47.2 : 21.0，农业比重大幅度下降，以工业为主的二产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比重有所提高。

从农业来看，1949 年，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比例为 95.6 : 4.4，农业内部农林牧渔的比例为 87.5 : 3.1 : 9.3 : 0.1。这种传统原始的产业结构，较长时间制约了成都市农业多种经营的发展。到 1978 年，农业与非农业产值比例为 76.8 : 23.2，农业内部农林牧渔产值的比例为 76.6 : 3.0 : 20.2 : 0.2。与 1949 年相比，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仍没有质的改变。

从工业来看，新中国成立时，成都是一个工业生产力低下的落后城市，绝大部分工业日用品由外地提供。新中国成立后，成都成为全国“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之一，逐步形成城市的工业特征。但总体经济效益不高，装备水平落后，1977 年全市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净产值只有 9.5 亿元，每百元产值提供利润仅 11.9 元；全市有乡及以上企业户数 4010 户，实现工业产值 3.8 亿元，其中重工业占 55%，轻工业占 45%；在产值构成中机电、化工、轻纺、冶金、食品行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86.6%。

（三）固定资产投资

新中国成立之初，成都城市经济突出地表现出“消费型”特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消费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在成都布点的一些重点工业企业相继建成投产和城市化的推进，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逐渐扩大，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有所增强。“一五”期间，全市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 亿元，并初步启动了以东郊为中心的大规模工业区建设。但在“二五”期间，投资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调，盲目投资加大，1958 年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猛增到 2.2 亿元，比上年增长了近 40%，之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连年扩大。1961 年，在国家经济调整压缩投资规模政策的调控下，全市固定资产投资额减少到 1.1 亿元。1963 年，投资规模开始稳步回升。1965 年，成都开始

进行“三线”建设，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 3.2 亿元。但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却使正常的经济秩序再次遭到严重破坏，1967 年，固定资产投资额下降到 1.4 亿元，1968 年再次下降到 1.2 亿元，投资效果也连年下降，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 15.5%。到 1978 年，成都市固定资产投资为 2.9 亿元，仅为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19.6%。

（四）市场消费

成都是西南地区重要的手工业、农产品和畜牧产品集散地。新中国成立后，成都建立起从批发到零售的国营商业系统，发展了合作商业，形成了以国营商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但是，在其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市场发展受到严重限制。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由于商品供应极度短缺，政府广泛采取按票证分配商品的办法，限制消费，市场基本上没有出现热点商品，主要是生活必需品的单一消费。虽然如此，由于消费型城市的特质和人口数量的增加，成都的消费市场仍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1978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13.8 亿元，较 1949 年提高了 5.3 倍。

（五）人民生活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成都的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1950 年至 1957 年 8 年间，物质生产稳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1957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24.4 元，与 1951 年相比，增长了 1.8 倍，年均增长 18.7%。然而，1958 年至 1976 年，成都先后经历了“大跃进”、“国民经济调整期”和“文化大革命”，人民生活出现了倒退、徘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仅递增 1.1%，人均消费支出年均仅递增 1.0%。由于物资的极度匮乏，生活水平更加低下，在消费支出中，食品类的比重占六成左右，其中农民消费有八成是用于食品。1978 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高达 57.6 和 68.5。

二、资源要素

（一）土地

成都位于四川省中部，四川盆地西部，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行政区域总